

芜湖：『长江巨埠』竞千帆

徐志

芜湖位于安徽省东南部、长江下游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500多年，自古享有“江东名邑”“吴楚名区”之美誉。青弋江穿城而过，汇入长江，浩浩荡荡向北奔腾而去。江南水乡的精致文化、多元包容的开放文化、勇于改革的创新文化、薪火相传的红色文化在此交织相融，奠定了芜湖“开放、诚信、务实、创新”的城市品格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芜湖儿女开拓创新、奋发向上。

微风皖韵 江南名城

芜湖古称“鸠兹”，《芜湖县志》记载：“鸠兹，芜地也。芜之见《经》，始此”。《诗经》开篇《周南·关雎》名句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中的“雎鸠”就是鸠兹。3000多年前，芜湖有一片沼泽地，水塘连片，草木丛生，吸引了众多雎鸠在此栖息繁衍，吕城故得“鸠兹”地名。公元前109年，西汉在鸠兹吕设县治所，因“鸠兹之地有湖，蓄水不深而生芜藻”，故将“鸠兹”更名为“芜湖”，沿用至今。

在芜湖的市中心，保存了一座千年历史的城央古城，见证了中华文明南徙、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变迁。东汉时期，吴将周瑜在这里点将陈兵，成为抗拒曹魏侵犯的军事要塞和江河港埠。唐宋时期，芜湖青弋江沿岸商贸繁华、水运发达，成为江淮、皖南地区盐粮、木材等物资集散地。唐代学者刘秩过芜湖时曾诗赞“近海鱼盐富，濒淮粟麦饶”，南唐时呈现“楼台森列”“烟火万家”的景象。宋代芜湖成为全国冶炼业中心，不仅有“铁到芜湖自成钢”之说，还诞生了芜湖铁画这一独到的艺术品，其以锤为笔、以铁为墨，以铁为纸，锻铁为画、鬼斧神工、气韵天成。自明代起，芜湖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商埠，呈现“十里长街、百货咸集、市声若潮”的兴旺景象。民间浆染业形成大规模，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指出，“织造尚淞江（上海），浆染尚芜湖”。芜湖是明清时期徽商经营最早、最成功的城市之一，被称为“徽商门户”，是徽商远处经商的起点，也是走向全国的跳板。胡开文墨店，是以芜湖为跳板走向全国的典型，也是近代芜湖商业翘楚。可以说，芜湖因江而兴，水运兴盛发展，奠定了芜湖的城市开放基因。

“半城山半城水”的自然本底，滋润了芜湖千年文脉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无数名人家留下了传颂芜湖的绝世佳作。诗仙李白出蜀远游、顺江而下，初次经过天门山，留下了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”的壮丽诗篇；3次携家寓居南陵，奉诏进京时，写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千古绝唱。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曾作一阕《蝶恋花·怀于湖》，“留春伴我春应许”慕景寄情，流露出对芜湖的热爱和眷恋；他

捐田百亩，汇而成湖，“环种芙蓉杨柳，鹭鸥出没，烟雨变态”，成就了今日长廊依依、细柳掩映的镜湖。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游历赤铸山，诗叹“干将昔此铸芙蓉，风雨千秋石上松。借问闾门腾虎气，何如江上锁蛟龙”。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寓居古城内的东退庵，终日以文会友，他的名著《儒林外史》中不少章节都直接提到了芜湖，在古城内至今还保存着一条儒林街。

风云激荡 红色热土

长江之畔、赭山脚下的芜湖，也是安徽红色文化最早的发源地，无数革命先辈都在芜湖留下奋斗足迹。1916年秋，革命先驱高语罕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任教，积极实施教育新主张，创办了安徽省首个学生自治会。1919年5月4日，北京爆发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后，高语罕发动学生联络芜湖各校掀起声援北京“五四运动”的学生爱国斗争，芜湖成为安徽最早响应“五四运动”的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城市。此外，王稼祥、李克农等先辈也都是从这片热土踏上了革命道路。1924年，王稼祥就读于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，组织并领导了芜湖“收回教育权，反对奴化教育”的爱国学生运动，芜湖也成为王稼祥投身中国革命的起点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中共安徽省委、中共皖南特委和安徽省委先后在芜湖成立，芜湖成为当时安徽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。

1949年初，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国民党企图凭借“长江天堑”阻止解放军过江，芜湖既是国民党军队精心构建的长江防线重点，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战略突破重点。在党的领导下，芜湖人民紧锣密鼓支援大军过江，有的提供粮食和柴草，有的亲身参与渡江战役。当年年仅14岁的“渡江英雄”马毛姐，咬牙坚持6次横渡长江、运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岸。1949年4月20日，第三野战军235团某部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在芜湖繁昌县率先登上长江南岸，成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。从此，革命到底、勇于拼搏、敢争第一、迎难而上、不怕牺牲的精神，激励着芜湖儿女在和平年代继续奋勇争先、一往“芜”前。

逐浪争先 创新高地

芜湖地理位置优越，连南接北、承东启西，倚江兴城、临江发展，兼收并蓄、开放创新的城市基因早已融入芜湖人的血液。1876年，中英《烟台条约》辟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，也是当时安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，以铁工、粮米、杂货贸易闻名遐迩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，被孙中山誉为“长江巨埠，皖之中坚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沿江而兴的“工业干道”，林立着造船厂、新华印刷厂、红旗机床厂、轴承厂等数百家企业，见证了芜湖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发展，也是芜湖工业立市的源头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芜湖人弘扬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城市精神，加快打造“创新之城”。改革开放之初，“中国第一商贩”——“傻子瓜子”创始人年广久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支“报春花”。1996年，芜湖的白马山水泥厂迎来海螺总部的“迁”入，1997年用置换资金“建”起了奇瑞，支持奇瑞成长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 的佼佼者，芜湖也成为国内知名的汽车产业基地。

在改革开放浪潮中，芜湖成为当时安徽“学上海、学先进”的排头兵。芜湖港是安徽省首个外贸港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安徽省第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。2008年，芜湖市被列入改革开放30年全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个典型地区之一。2018年，芜湖市入选改革开放40年发展最成功城市之一。随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，芜湖开放步伐迈得更大。

“鸂鶒展翼，江海弄潮。”芜湖这座长江之滨的古城，将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中、在安徽省委的战略定位中，走好新时代质量更高、效益更好、结构更优、活力更强、优势充分释放的创新发展之路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芜湖篇章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芜湖市市长）



李大钊诗歌中的民族情怀

王善英

“钊自束发受书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，实践其所信，励行其所知”，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《狱中自述》中的明志之言。他为民族之辱而痛、为民族之困而愁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，最终为民族而牺牲。李大钊深切的民族情怀不仅体现在其哲学、政治学、历史学等著述中，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。

为民族之危殆而落寞悲愁

李大钊早期的诗歌充满了对落后、战乱、苦难之民族的悲愁之情。1907年，年轻的李大钊便心怀报国之志，为探寻民族救亡良策而踏上求学之路。正如他在《狱中自述》中所言：“钊感于国势之危迫，急思深研政理，求得挽救民族、振奋国群之良策，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”

1908年，李大钊作《登楼杂感》：“荆天棘地寄蜉蝣，青鬓无端欲白头。拊髀未提三尺剑，逃形思放五湖舟。久居燕市伤屠狗，数觅郑商学贩牛。一事无成嗟半老，沈沈梦里度春秋。”此诗广用典故，所涉皆与民族、国家有关，其中人物皆为爱国志士，具有民族情怀。一方面，李大钊借刘备“拊髀未提三尺剑”之典故比喻自己欲建功立业而又不能的悲伤之情，借荆轲、高渐离刺秦之典故寄托对英雄功未成而身先死的遗憾，借郑国牛商弦高之典故表达自己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愿望。另一方面借“蜉蝣”喻人生苦短、时光易老，“感慨韶华似水流，湖山对我不胜愁。”一种对岁月蹉跎而无所建树的愁闷之情扑面而来。“家国十年多隐恨，英雄千载几

荒邱。”渲染了一种家国遭难而英雄落寞无为的孤独忧伤之情。“海天寥落闲云去，泪洒西风独倚楼。”更是将这种孤独忧伤之情推向高潮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爱国青年孤独地伫立在风中，仰天而望，以至潸然泪下。

为民族而战斗的壮志豪情

随着思考的深入和思想的发展，李大钊对于民族危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虽依然有愁闷之情，但这种愁闷之情逐渐被内心冉冉升腾的豪迈之情所取代。1909年冬，李大钊在《岁晚寄友》（二首）中写道：“九世仇堪报，十年愿未违”“廿年余壮志，千里寄新诗”。面对因帝国主义入侵、军阀割据而四分五裂的祖国山河，李大钊内心升腾起为国复仇的坚毅之志。这是一位有志爱国青年内心的独白，体现了李大钊从最初的苦闷忧愁到逐渐坚定意志的转变。在《哭蒋卫平》（二首）中，李大钊一方面为满目疮痍的民族而痛哭，“国殇满地都堪哭，泪眼乾坤涕未收”；另一方面又为失去好友而悲哭，“半世英灵沉漠北，经年骸骨冷江头”。李大钊感慨未能如战友一般亲身为国家民族而战斗的遗憾，“我入平山迟一步，君征绝塞未曾回”。同时，也表达了自己意欲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冲天豪气，“千载胥灵应有恨，不教胡马渡江来”。

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，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在照耀，李大钊心中的革命道路越来越清晰，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其诗歌中。在《赠筱舫、寿山》（二首）中，李大钊写道：“策马玉门关，不为儿女颜。悲

歌辞易水，壮志出天山。”诗中流露出一种策马奔腾的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概。1916年，李大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，在太平洋舟中作：“义声起云南，鼓鼙动河北。绝域逢知交，慷慨道胸臆。中宵出江户，明月临幽黑。鹏鸟将图南，扶摇始张翼；一翔直冲天，彼何畏荆棘。相期吾少年，匡时宜努力。男儿尚雄飞，机失不可得。”此诗慷慨抒胸臆，表达了作者对投身革命的期待向往和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。他寄望自己和时代青年心怀凌云报国之志，如大鹏展翅般不惧风雨、勇往直前。在《送幼蘅》中，李大钊写道：“壮别天涯未许愁，尽将离恨付东流。何当痛饮黄龙府，高筑神州风雨楼。”明确表达了其抛却忧愁、投身革命的决心，并期待革命胜利之时，痛饮三杯、再造神州，一股英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。

为民族而牺牲的大爱真情

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，李大钊的诗歌形式逐渐由古体诗向新诗转变，但其深切的民族情怀始终不变，其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人动容。在《黄种歌》中，李大钊用直白的语言阐明了自己的革命态度：“不怕死，不要钱，丈夫决不受人怜。洪水纵滔

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



进的轨迹和发展趋势，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历史观。

抗战宣传

展厅第三部分呈现的内容为“抗战作家——随军战地宣传”。1937年，张天虚奔赴延安，参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，担任通讯股长。8月，张天虚创作了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《王大爷》，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、有力的出力，全民参加抗战。9月22日，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，打着红旗，唱着抗日歌曲，用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，浩浩荡荡、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，张天虚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，写下了《军训日记》《西线生活》《征途上》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。

1938年，张天虚随薛孤帆（薛子正）等同志到滇军（60军）184师工作，扩大了我们党在184师的影响。张天虚跟随60军转战安徽、河南、湖北，参加了武汉保卫战。既是军人又是记者的张天虚主编了184师的战地小报《抗日军人》，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。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张天虚的《运河的血流》和《火网里》两个报告文学集。

武汉失守后，有人告发已升任新三军军长的张冲“通共”，张冲被解除兵权。张天虚也被迫离开184师回到昆明。受南方局派遣，张天虚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《中国新报》的编辑工作，宣传党的统一战线。郭沫若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张天虚：“力疾服务，勤劳有加，尽力启发侨胞，打击敌伪，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。不幸疾转剧，咯血过猛，曾旦夕昏睡，失去意识，乃不得不回乡疗养。”1941年1月，张天虚因病回国，8月10日，因肺病恶化，在昆明去世，葬于呈贡。1943年，迁入昆明西山名人墓园、聂耳墓旁边。郭沫若十分惋惜地为张天虚写了500多字的墓志铭，记述了张天虚短暂而光辉的一生。墓志铭结尾写道：“虽未永年，业且不朽。铭曰：西南二士，聂耳天虚，金碧增辉，滇洱不孤。义军有曲，

弦歌百代，永示壮图

走进云南昆明张天虚故居

郭旭初

故居新访

铁轮有书，弦歌百代，永示壮图。”张天虚不断追求进步、不断努力学习的一生，给同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43年，楚图南在《由致悼张天虚君所想起的》一文中说：天虚“所留给我们的，则是对于生活百战不殆的努力，与对于理想和希望的永久进取的心情”。